

人生本不苍凉

——民国十六名士写真

张建安 著

rensheng benbu cangliang

宋教仁

彭泰民

廖仲恺

邓演达

杨杏佛

蔡锷

蒋百里

杨杰

邵飘萍

林白水

成舍我

史量才

杜重远

黄郛

商务印书馆

梁漱溟

人生本不苍凉

——民国十六名士写真

张建安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本不苍凉:民国十六名士写真/张建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6776-8

I. 人… II. 张… III. 知识分子—列传—中国—民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696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人生本不苍凉

——民国十六名士写真

张建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776-8

2010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22.00 元

自序

知识分子之血性与良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体现，而其秉承中华文化至刚至大之正气，勇于担当历史使命之大抱负，则历千万世而有所不同。

此书中所讲事例，多为乱世民国时表现的高贵品质，只有两篇讲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在特殊年代“文革”中之表现，与现在社会并无联系。

有人或曰：乱世已过，错误已改，而今国家兴盛，人民富足，文化多元，正呈现前所未有之好势头，何必提这些？

我答：思甜还要忆苦呢！况且，欲谋求中华文明之真正复兴，求万世之太平，则必借助知识分子之血性与良心。唯其有血性，方能进步，敢仗义执言。什么是“义”？“义”乃“公义”，唯有“公义”，方能真正为“公益”服务；同样，唯其有良心，方能识大体，知国情，自然而然，廓然大公，既知晓今日之人民政府之于人民幸福之重要性，从而拥护之；又能发现社会所存在之问题，从而揭发改正之。起码，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会贪得无厌，不会害公而私己，不会草菅人命，不会醉生梦死只知金钱而毫无高尚之追求……

知识分子的良心，是一个民族之根本良心。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应该清醒。即便在盛世，也需时时警惕，居安思危。而更重要的是，有血性与良心，便当尽力把握时代之脉搏，探索未来之大道，在

人生本不苍凉

经济获得进步的同时，当引领国民走精神高尚之路。

本书进而由十六位逝者的经历，探索人生之苍凉与否？

倘若以人之终点为“死”，则人生是以一悲剧而终，如树叶枯槁而随风飘逝于秋风萧杀之中，夫不苍凉乎？但以人之能动性，若以浩然正气充斥天地，成就自我，造福苍生，则虽历艰险苦痛，又何谈什么苍凉？此中真义，唯读者自鉴！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先后得到马本寅、梁培宽、成幼殊、彭嘉柔、黄方毅诸先生的帮助；出版过程中，蒙王春瑜先生、丁波编辑相助，并得袁鹰老师来信鼓励，令我激动之余生出许多力量。特此致谢！

张建安

2009年9月28日

于晴暖阁

目 录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1
----------------------	---

宋教仁之死，为中国近代民主法制进程投下了浓重的苍凉色彩，令无数的仁人志士悲痛不已。他们不仅为宋教仁悲哀，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正如于右任先生所说：“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与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

彭素民：“死便埋名也自由”	14
---------------------	----

1924年8月3日，彭素民积劳成疾，病逝于广州博爱医院，年仅40岁。追悼会上，主祭人廖仲恺悲痛之至，“于军乐呜呜声中，歔噓饮泣，全场注视，皆为动容。”

值得注意的是，彭素民致力革命二十余年，“未尝为家谋”。所任职务不可谓不高，但他不谋私利，为革命鞠躬尽瘁，乃至英年早逝后，竟然“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

廖仲恺：举家殉国亦不惜	32
-------------------	----

在威胁越是迫近的时候，廖仲恺越是坦然自若，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说：“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

他还说：“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53

何香凝与茅盾怎么也忘不了邓演达“热血男儿”的形象：“他就是择生。他有独到的政治见解，他具备着几乎近于执拗的顽强的个性——他能写、能讲，他对中途背叛了总理（指孙中山）遗教的那些升官发财之士表示了无穷的憎恨。他又能带兵，能打仗……”（何香凝：《忆邓择生》）“尽管他依从理性的指示，竭力使他生活纪律化，因而举止言语也有强烈的纪律味儿，但终于不能掩盖他本性的热烈的感情，他实在是一个热情的人。中国话有一句叫做‘热血男儿’，我想择生先生就是这称呼的典型”。（茅盾：《一段回忆》）

杨杏佛：“为人权流血第一人” 73

杨杏佛既是“为人权流血的第一人”，也是一位有牺牲精神的热情的歌者。热爱民主、科学、自由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他，而在回顾他的事迹的时候，是否也可听到他的歌声：

人们，你苦黑暗么？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膏血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蔡锷：“但为四万万争人格” 90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流日益张狂，蔡锷的愤慨之情也越来越激烈，他愤愤地对朋友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

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便安然登上大宝,这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蒋百里:做一个有骨气有作为的中国人 108

民国二年(1913年)6月17日夜,蒋百里又憋着一肚子气由京城回到保定,他的气色非常难看,下定了自杀的决心,接着便写起了遗书。

留给母亲的遗书这样写着:“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国民有益。遗币二百,薄田数亩,聊供赡养。”

杨杰:绝不为亡者之臣 141

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议,发出了全体会议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唁电,揭露了杨杰将军的死因,并给予杨将军高度的评价:

“惊闻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人,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人,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设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邵飘萍为“新闻救国”而死 163

回顾邵飘萍的记者生涯,面对死亡威胁的次数不可谓不多,邵飘

萍有时也免不了与常人一样会“心悸”，但他将责任心建立在“新闻救国”的信念之上，所以并不退缩。《新闻学总论》中，邵飘萍仍再三强调新闻记者的责任心，称：“新闻记者之尽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张勋复辟之役，余因亲赴天津发电，彼时京电局为辫子兵所占守，途经丰台，夹杂两军之中，几死于流弹之下。当时之危险状态，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若果死，则责任心命我不得不死也。”

林白水：赴死岂能无眷恋 187

林白水自知大祸将临，他神态自若，要求给家人写遗嘱。遗嘱写道：“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等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外玉器两件，铜印一个，又金手表一个。”匆促之间，“八月六日”错写为“八月七日”。

成舍我与《民生报》被封事件 200

成舍我本人曾在《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一文中回忆此事：“民国二十三年，我所主办的南京《民生报》，因为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经手建筑行政院官署，贪污舞弊，汪（兆铭）是行政院长，不料竟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重大冒犯。虽然铁证如山，他仍不顾一切，以最大压力，将《民生报》非法封闭，将我非法拘禁了40天，并永远不许我在南京办报。此在当时，曾为一轰动全国之巨案。我出狱以后，他叫人示意，如果我向他低头，则一切不难和解。那位居间奔

走的朋友劝我，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结果总要头破血流的。我曾执拗地答称：“我的看法，与你恰恰相反。我相信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其后我又在上海创办立报……”

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213

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

蒋介石特地召见史量才，要求《申报》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影响，并不无威胁地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非常反感，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介石盯着史量才，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你如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会客气。”二人不欢而散。

杜重远与新生事件 227

宣判一出，法庭内外顿时群情激愤，民怨沸腾。被告律师吴凯声要求改科罚金，庭上不准。又要求上诉，法官称“环境不许可”。这时候，杜重远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大声说：“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者也更加愤怒，许多人喊着“打倒卖国贼！爱国无罪！”等口号。在场的日领事馆秘书田中见状大骇，由法警多人护送，仓皇离去。

黄炎培：走向“胜利”与“民主” 245

在延安，自由民主的氛围感染着黄炎培，振奋的情绪萦绕在黄的心头，令他思绪万千。他还异常高兴地见到了已逝知己邹韬奋的儿

子,并在“自发的情感”逼迫下写《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他想到好友的去世时热泪流淌,而提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即将实现时则情绪高昂,激动地写道:“虽然,死者已矣,凡我后死,忍忘天职之未酬!今日者,暴敌行将就歼,国事亦将就轨。胜利!胜利!民主!民主!君所大声疾呼者,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呜呼!韬奋,呜呼!韬奋,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马寅初和他的《农书》..... 253

最令马寅初心痛的还是他的《农书》。那是他的心血,整整一藤箱,几十卷手稿,花费了多少不眠之夜!寄托着多少对国家对人民的厚爱!

可是,如今,手稿被一卷一卷地送入炉火中,没了。

马寅初知道,他不可能再写同样的手稿了。

这是他永远的遗憾!

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激动地说:“我们再也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266

梁漱溟之所以可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并在狂风骇浪中气定神闲。这种态度似乎还来源于他的“天命”观。他在思想的深处认定自己是负有重大历史使命之人,所以曾有“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失色”的狂语,而且在战争年代也根本不惧弹炮的危险。这与孔子的行为也是非常一致的。他们都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的命不是随便什么事情什么人就可以夺去的,而只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后才可以

离开人世,有了这样深层的自信,就如同大海中有了定海神针,外界如何变动,他其实是处在自然而有为的状态,根本不会因外界的风雨而有所动摇的。那么,“天命”之说是否有迷信的倾向?字面上似乎如此,实则不是,这其实是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自信,对真理之追求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既然将真理看得比生死都大,那么死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这样的人相比于一般人来说,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自然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他们总是代表着国家的长远利益乃至人类的优秀品质,称其为“承天命”又有何不妥?同时,既有如此的底气,那么,具有莫大的勇气和胆量也就自然而然了。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车站，就在宋教仁事业即将达到巅峰，将要为中华民族的民主法制进程立下里程碑的关键时刻，三颗子弹无情地飞来。

像所有的血肉之躯一样，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宋教仁，转瞬间倒在血泊中。人生之无常令人伤感。

宋教仁没有马上死去，而是在医院忍受极端苦痛后离去的。这种结局更是令人心碎。

剧烈的疼痛像毒蛇一样疯狂地无休止地折磨着宋教仁，使这位铁血男儿无法忍受，他呻吟着，恨不得马上死去，好了结这痛苦的生命。这是宋教仁平凡的一面，他没有古代英雄关云长那样神话般的意志，所以他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大喊着疼痛，让人惨不忍睹。

然而，宋教仁在临终前又显示了他不平凡的一面。在医院痛不欲生的时候，宋教仁仍不忘国事。此次他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原是为国为民，要调和南北，争取宪政立国的，没想到壮志未酬身将死。他授意国民党首领黄兴代拟致袁世凯总统电文一封：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自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犹，从未结怨于

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这件事让人尊敬也让人痛心，智慧如宋教仁者，依然难脱文人的底色。他哪里知道，即便自己人品再好，“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犹，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但政治斗争的残酷，黑暗势力的恶毒，是不会怜惜什么“君子”的！而宋教仁所致信的袁世凯，却正是要他命的幕后主使！

宋教仁之死，为中国近代民主法制进程投下了浓重的苍凉色彩，令无数的仁人志士悲痛不已。他们不仅为宋教仁悲哀，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正如于右任先生所说：“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与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

十几里的路程，十几层的人群，长长的聚汇着官、绅、商、学各界人士的送殡队伍，他们在哀乐中叹息着、哭泣着……当人们在灵前向宋教仁鞠躬送别时，同声唱起了悲壮的悼歌：

生为奇杰兮死为神明，
浩然之气兮天地充盈。
吾人宜继志以慰精灵，
倡平民政治愿作牺牲。
惟痛绝暮春殄我天民，
申江呜咽永作不平鸣！
内江急，外侮生，

愤奸贼敢坏民国长城，
亿万万人血泪倾！
一堂浑不辨歌声哭声！

功不可没的宋教仁

宋教仁，字遁初（亦称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幼年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99年转入漳江书院学习，眼界始开，在了解到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萌生了反清志向。1903年，宋教仁以第一名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年6月，宋教仁与黄兴订交，纵谈天下时事，商议反清事宜。其言论引起官方注意，被迫离开学校，回到湖南。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宋被推举为副会长。此后，他积极联络革命志士，策划发动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留学东京。

宋教仁志向坚定，怀忧国忧民之心，虽遭挫折，但继续革命活动。1905年1月，他与田桐等人发起组织了“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研究学术为名，鼓吹反帝反清。不久之后，宋教仁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二人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宋教仁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与此同时，还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庶务兼撰述员，以其雄健笔



参加起草中国同盟会
章程的检事长宋教仁

风备受称颂。

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1907年4月，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前往东北联络义军，试图与南方起义相呼应。起义再次失败，宋教仁被迫避居大连，后复返日本，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进行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又与现实紧密相连。

宋教仁显然试图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他进一步意识到专制和腐败是中国落后被打的两大病根，欲铲除病根，必须对症下药——最好的良药就是民主、法制、加强监督，而要达到这几点，又必须通过激烈的革命，铲除封建王朝。宋教仁虽在书斋，但时刻关注着势态的变化。

这一时期，宋教仁得到一个消息：日本试图将中国长白山下的延吉变为间岛，并入日本领土。为实现其贪婪野心，日本参谋部组织了长白山会、黑龙江会和南满株式会社，试图通过这三个组织逐步将中国的延吉、黑龙江和东三省吞并。其中，长白山会专门负责伪造证据、史料，以“证明”延吉是间岛。

宋教仁热血沸腾，面对祖国领土即将遭受严重侵犯的现实，他决定不顾个人安危，打入日本机构，研究出有力的对策。为此，他在友人的协助下打入长白山会，冒着生命危险，获悉了大量要把延吉变为间岛的伪证，并拍照留备铁证。退出长白山会后，宋教仁赶赴汉城图书馆和东京帝国大学，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终于完成《间岛问题》一书。此书以确凿无疑的史实，证明延吉地区向来是中国领土。此书深刻揭露了日军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此后，当日本政府在中日谈判中气焰嚣张地谈到延吉主权问题时，中国政府由于有《间岛问题》一书作后盾，顺利地瓦解了日方的攻势，保住了这一领土。可以说，宋教仁功不可没。

鉴于同盟会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数次起义均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于1910年提出新主张，建议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组织领导长江革命。此举得到谭人凤等多数同盟会会员的支持，为日后武昌起义的爆发埋下伏笔。次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奉东京本会为主体”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宋当选为总务会干事，分掌文事部，积极推行“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的策略。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抵达武汉，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在新政权的组成上，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坚持总统不握实权的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这一主张不仅与孙中山有分歧，也被各省都督府会议所否决。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孙中山任为总统府法制院总裁。

其实，宋教仁最初是被孙中山提名为内务总长的，却没能在临时参议院通过。对此，有人为他抱不平，宋教仁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显然，临时政府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不久，拥有重兵的袁世凯在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间极尽周旋恐吓压制离间之能事，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声称拥护民主共和国，孙中山按照事先诺言“辞职引退”。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推荐唐绍仪组织第一任内阁，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总长。三月后，唐内阁垮台。7月初，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务，致力于党务工作。